

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REVIEW: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edited by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改革历程：赵紫阳

赵紫阳，中国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反对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学生抗议的人物，在四年前与世长辞了。中国的高层领导组织了 " 紧急应变小组 " 宣布当时为 " 极度敏感时期 " 并要求解放军戒严且对进入北京的旅客严加检查。假如这便是北京高层面对赵紫阳先生在中国逝世的态度，那他们又会采取何种态度来对待"改革历程"这本赵紫阳死后才出版的书？一本描述他屡次痛斥那些使用卑鄙的手段陷害、毁谤并推诿责任的虚伪小人而如今却仍大权在握的同盟与继承人的书呢？

且不论这事件的后续结果为何，但当初的同一群人因为共同利益而结合并且成功地在混乱中存活下来，更能在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今天持续掌权。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生存之道，能令其不间断地保持在优越的地位。

而在这个族群当中，为了保持其优越地位也偶尔会牺牲一两位 " 道不同不相为谋 " 的同志。1989年，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及当时经济改革主要推手的赵紫阳便是其中一位壮烈的受难者。赵紫阳先生当时寄望以该党前所未有的胸怀和民主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却在1989年5月17日遭到否决，接连在19日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六月四日当天，解放军开枪扫射北京街头的抗议群众，死者数以百计。而后赵先生被控诉在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最终在软禁监控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逝世，享年85岁。

在这本书中，时间横跨了二十年，赵先生也似乎亲身来控诉这一切的不公，特别指出李鹏、李先念、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与王占等人侵犯他身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权利，并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背着他召开会议继而以武力血腥镇压民运。

这本书的内容根据赵先生于1999年至2000年中小心翼翼所录下的三十盘录音磁带所归纳而成。其中有些重要的录音片段以及中文翻译本也可望随之公开。而书中资料的出处来源也多半与《中国「六四」真相》此书相同，并包含了2007年所出版的关于赵紫阳先生与其好友Zong Fengming的中文对话录音。然而近距离的真

人对话口吻乃是本书更胜于前、也更相形引人注目的特点。

学者们可能会质疑“改革历程”此书与史学资料有细微的区别。书中更明确的道出赵先生在1988年时，早在民运开始以前，便已卷入政治的风波。而赵紫阳与胡耀邦，这两位既是改革者也是老战友，早在1982年经济改革政策上的看法就有所出入。邓小平则在这群人当中明显地扮演着“教父”的角色。大家都争相接近他又不敢忤逆他，并引用他的话语来彼此攻击。邓小平就在这群龙争霸中，尽量避免担起这些困难的决策的风险与责任，同时也可看出在这独裁政治当中也充斥着许多不安的氛围。

有时候这些在上位者，似乎与其所统治的社会民众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就拿赵紫阳来说，纵然他要比任何人都亲近老百姓一些，也似乎更关心学生运动，但他却有许多错误的印象。他认为在六四时期，许多老弱妇孺躺在大街上阻止解放军军队的进入。而事实证明，当时虽有北京民众试图阻挡解放军进入，但并无妇孺躺在大街上。赵先生也痛惜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在六四时期，成为头号中国政府所通缉的要犯，并认为由于方励之避走他乡，在海外严厉控诉邓小平导致了政治气氛的急速恶化。但事实上，方励之当时人并未出国，就住在北京近郊谨慎而沉默地观望着这一切的变化。更直指核心的问题是赵紫阳与其它的高层领导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回全国性的抗议的根本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对西方民主思潮的肤浅向往，也并非单单只是出于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有所不满；更进一步的说，是出于对腐败特权和共产党所提出无用的“单位系统”所产生出根深柢固的深恶痛绝。

1989年时，赵紫阳曾力劝其它高层领导与抗议学生进行和平对话。他在当时坚信，抗议的群众绝对不是“反对党的政治与领导”而单单只是要求“改正小小的瑕疵与漏洞”。我们不禁要问，赵紫阳本人真的相信这想法？还是他只是运用这点来当作学生运动的掩护？当然学生们明白与领导阶层对立的白热化将会是一件多么莽撞、危险的事。然而仅只是把学运归结成“漏洞与瑕疵的改善”似乎也有点过于天真。当某些话不能在公众面前说白，学生们自然求助于运用这些“双关语”，正如同他们所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等等。更有些淘气、促狭的歌词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新中国”三个字却被唱歌的人特意地趋于模棱两可了。

讽刺地是，赵紫阳在1989年后被监控软禁反而让他更贴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他的守卫告诉他，打高尔夫球似乎有些“不方便”使他必须猜想那些并不是白纸黑字的规定到底是什么？而他必须用哪些“借口”以及挖空心思在使用哪些华丽却空泛的词藻来跟政府官员们打交道。他对这不平待遇的愤怒可以看出，他似乎这

才头一回学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所需的繁文缛节。

也正是因为受到软禁，他也才有充足的时间能阅读并广泛地反映出当时中国在历史上的局面与情势。在这本书的最后，可以看出赵紫阳先生以一种他前所未有的、与中国政府唱反调的激进角度提出他的看法。他断定中国未来会走向一种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的道路。共产党也将会释出多年来垄断的大权。中国最终会形成一种议会民主的政体。

而在生命的最终，他才观察归纳出中国政权总是由一群在政治、经济与智力上的菁英份子所领导，而他们之间也充满着利害关系。这些精英把持着国家的政权窃为私用，也因而阻挡了国家的改革与进步。他也指出中国经济上的进展其实是由于这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所带来的。社会的统治者夸耀他们自己让百万人摆脱贫困；而恰恰相反的是，这几百万人其实是通过自己长时间地努力工作来脱贫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些人向上的动力，无形中促使经济有了空前的成长、创造出丰硕的成果与财富。

而这些上层菁英份子，即使感受着动荡不安，仍旧坐稳高位，控制着整个中国的未来。

林培瑞，《中国「六四」真相》共同编辑，现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主任